

“双百”方针出台前后

肖干南

为有源头活水来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关于京剧有个争论,一派主张全部继承;另一派则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主张全部抛弃。为此,毛泽东给戏曲界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不久,中宣部约请史学家撰写《中国史概要》,请教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把稿子印发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委员会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1955年,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中共党史编写问题,毛泽东又说:“百家争鸣。”而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则是1956年的春天。

千呼万唤欲出来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郑重宣布,我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知识分子摘掉了“剥削阶级”的大帽子;同时,还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

剑英等,并托他们转告党中央。叶剑英迅速就此电转告中央。22日,项英抵达南京,叶剑英与秦邦宪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告诉他党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政策。23日,项英离开南京前往延安。26日,叶剑英与秦邦宪致电张闻天与毛泽东,报告了项英已启程赴延安,并替项英说明:“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之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

叶剑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还充

号召。

2月,在毛泽东寓所召开如何领导科学工作会议上,陆定一揭露和批评了苏联在领导科学文化上的教条主义,认为学术与政治不同,允许自由讨论,不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另一个学派。毛泽东表示赞同。就在这个月的中旬,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苏联学者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看法。当时,有人提议把这一事件通报给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为此事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说:“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

3月5日,刘少奇接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工作的意见,批评政治上对文艺干涉太多、粗暴,说:“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没有正式文件,就可以当作个别人的意见,可以不听。”3月8日,刘少奇听取文化部党组汇报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

当了联络据点的作用。中央派到南方游击队工作的人,均经过南京。到豫鄂皖边区的郑位三、往闽西南边区的方方等皆由南京中转。中央要与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也由叶剑英他们去办理,11月初,叶剑英就奉党中央的命令,派顾玉良前往江西、福建联络黄道、叶飞等率领的游击队。同时,红军游击队有人要赴延安,也由南京中转。在这些过程中,叶剑英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传达党中央的精神,大大推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自己好的要保持、发扬，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吸收。”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组织党中央讨论研究，撰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漏子，就是讲秘密报告无论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在3月19日、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有利于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探索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主义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指出，“若干年来，我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的不少研究工作者至今仍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4月18日，毛泽东注意到一份摘报记录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哈格尔批评过去对待苏联科学和哲学上的教条主义态度，写下“此件值得注意”的批语，要求中宣部组织讨论。至此，“双百”方针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

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总方针。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时，陆定一在4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是错误的。有人在28日说，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当天，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采纳了讨论中的意见，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

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他展开论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只有反革命议论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确定“双百”方针是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同时又界定了实行这个方针的范围：在人民内部、在宪法之内。

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后，犹如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各方面反响十分强烈。一时间，为什么提出“双百”方针，怎样实行这个方针，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为此，刘少奇指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报告。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陆定一说，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他指出，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是“左”的简单化的片面性；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无关，则是一种右的片面性。因此，他认为，“双百”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陆定一的报告在学术界、文艺界引起激烈的讨论。会后不久，他收到郭沫若、茅盾等72封来信，陆定一吸收这些人的一些意见对讲稿作了修改。6月7日，陆定一将修改后的讲话稿，连同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的5封来信，送毛泽东审阅。6月8日，毛泽东批示“可以发表”。6月13日，陆定一的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是春天永远留在北京的舞台上”

党中央确定“双百”方针后，改版已成为《人

民日报》贯彻“双百”方针的迫切需要。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奉《真理报》为圭臬,这次改版解除“学习苏联”带来的条条框框,是一次思想解放。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这天的社论《致读者》表示要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改版后的《人民日报》气象焕然一新,突出之点是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8月,文化部和中國音协在北京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演出了各个时期各种风格、各种题材和形式的音乐节目,还就当前音乐工作中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24日,毛泽东和音协负责人等有关人员一起,针对讨论的问题,系统阐述对中西文化关系和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非驴非马也可以,”“民族的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中国化,而不是越搞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于在音乐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是一次很好的指导。

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郑重宣布:“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学术和艺术方面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是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

“双百”方针一提出就得到文艺界的热烈响应。中国作协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贯彻这一方针,并根据这个方针的精神总结以往的工作,尖锐地批评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文艺报》发表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满怀喜悦和信心,迎接文学艺术的春天。正如剧作家吴祖光在《六月的北京舞台》一文中所说:“就在这桑结紫椹,榴花照眼的时候,6月的北京却是百花盛开,蜂忙蝶乱;涌起了无限春光,”“是春天永

远留在北京的舞台上了!”

“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

“双百”方针出台后,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此文说“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学艺术中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劝告”党取消这一方针。这篇文章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当天就指示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到会各同志。此后,毛泽东在几次会议上批评这篇文章,说:“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他认为,“双百”方针合乎辩证法,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

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针对部分人的疑虑,说明“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能收,只能放”,不要怕争鸣。会后,毛泽东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一路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问题。他在一篇讲话提纲中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一个强国而使人可亲。”

1957年6月19日,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于《人民日报》。毛泽东在此文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双百”方针贯彻一年来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一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口号,找到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道路。